

组织社会学译丛 李友梅 主编

# 行动中的组织

—— 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

##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Social Science Bases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美] 詹姆斯·汤普森/著

James Thompson

敬义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组织社会学译丛 李友梅 主编

# 行动中的组织

—— 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Social Science Bases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美] 詹姆斯·汤普森/著

James Thompson

敬义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美)汤普森(Tompson,J.)著;  
敬义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组织社会学译丛/李友梅主编)

书名原文:Organizations In Action: Social Science Base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ISBN 978 - 7 - 208 - 07297 - 8

I. 行... II. ①汤...②敬... III. 组织社会学-研究 IV. C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729 号

责任编辑 田青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

· 组织社会学译丛 ·

### 行动中的组织


——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

[美]詹姆斯·汤普森 著

敬义嘉 译

---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www.hibooks.cn  
世纪高教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021-63914988)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64,000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297 - 8/C · 292  
定价 18.00 元

## 译者序

汤普森的“职务生涯构建”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重建和发展的黄金时期,该时期的学术发展和公私行政实践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特点。学术发展呈现出两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首先是学术战争红利的出现,即大量被战争延迟、限制、中断的学术活动和部门得以恢复和扩展,经验研究的成果更加丰富,而政治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刺激了新的学科领域的产生,学科间的融合现象也日见频繁和深入;第二是伴随美国力量和影响的全球化,其学术思想和潮流在趋向主导世界的同时也显示出兼收并蓄的姿态,国别的和比较的研究很快占据了学术出版物的重要篇幅。这些趋势,结合汤普森学术经历的复杂性和学术实践的多样性,为本书奠定了跨学科的和比较研究的基调。其中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的影响尤其显著,产业组织理论和经济学也有相当分量。

二战后复杂组织行政实践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则是激发汤普森从组织视角做行政理论研究的社会原因。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企业面临的市场、技术和制度环境迅速变化,导致在产权安排、企业结构、管理战略等诸方面的创新,例如联合投资和连锁经营等组织形式的出现;同时后工业化使与外部环境存在更多相互渗透和依赖的服务业的比重

不断增加。在公共组织领域,发达国家的政府规模进一步扩张,社会项目激增,行政机构膨胀。1951年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不包括军事人员)比1931年增长了3倍,从59.6万人增加到245.6万人。对行政效率和有效性的评估提上日程,如1968年英国福尔顿报告,就明确指出传统白金汉宫行政模式下对牛津—剑桥通才教育的青睐导致官员长于决策而疏于管理。社会对行政教育的需要方兴未艾。美国MBA的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趋于成熟,而公共行政教育在60年代末也已经从管理学或政治学中独立出来自成体系。这些发展在继续展开组织行动的领域和层面时,也为经验地批判和总结已提出的组织理论提供了条件。

与国内已经出版的组织理论方面的书籍相比,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或者说汤普森学术生涯巅峰时代的流行学术特征,是对于不同学科甚至不同范式的组织理论的整合。汤普森是这个年代的组织理论整合的集大成者。这种整合努力在汤普森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关于组织的社会决定与理性自治、开放性与封闭性等基本争论,汤普森理论框架的解释性是最完备的。

汤普森的组织理论思想存在两个主要源泉:西蒙(Simon)的决策理论和旧制度社会学理论。西蒙通过构建组织微观行为基础,即人和组织的有限理性,从决策角度部分地沟通、调和和修正了组织理论领域内对立的经典管理范式和人类关系范式。以塞尔兹尼克(Selznick)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旧制度社会学派则将组织视为适应性的有机系统,同时受到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和环境压力的影响,从而在结构上表现出社会决定的特征。“行动中的组织”(organizations in ac-

tion)的概念,最早可见于塞尔兹尼克在1949年所著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当局在行政过程中所奉行的草根政治原则的案例研究中。汤普森整合努力的基本方向,是将后者所确认的封闭系统外的影响因素引入到前者关注的有限理性下的决策活动中,并在古尔德纳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发展基于应对不确定性的行政管理理论。在管理学和社会学之间,汤普森选择了折衷的“体用”的方案,即以探寻规律性为体,而以有效行政为用。汤普森对社会科学的强调并不能否定该书同时是公司经理和政府行政人员的最好读本,这可以从书中的92个行动命题确知无误。

一般认为汤普森是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的创始人之一,即组织要针对任务环境要素、因果理解、技术、目标、组织内相互依赖等存在不确定性的基本决策要素而建立适应性的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模式。汤普森发展和整合了古尔德纳概括的组织分析的两个模型。理性模型下,资源、活动、产出都是合宜的和可预计的,一个统揽一切、目的明确的主导计划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在自然系统模型下,影响组织后果的变量超出了组织的控制范围,不仅组织内部的成分,而且组织与更大的环境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汤普森用开放系统的概念将组织行为的功利性和社会性结合起来,指出复杂组织行政的基本职能是通过对组织的多重行动流的调配,处理在相互依赖而非绝对控制条件下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实现其组织目的。在组织的三种不确定性来源中(见第十二章),一般的不确定性和偶然事件都是任务环境决定的,内部的相互依赖是由技术特征决定的。组织行政的基本方法是在有限理性的背景下,尽量通过对内部结构和流程

的设计来适应技术理性的需要,同时通过建立开放的专业化的边界扩展部门来处理对外尤其对任务环境的依赖,并且实现两种行为的协调与配合。这种分层的组织结构设计实现了技术核心与任务环境的缓冲,用组织理性保护技术理性,在制度的和长期的层面上使组织获得灵活性,而在技术的和短期的层面上使组织获得确定性。复杂组织的结构从外到内表现为一个从开放到封闭、从灵活性到确定性的谱系。

汤普森理论的完备性当然也是有限的。20世纪50到60年代在实践和理论上对于组织发展面临的问题而做出的反应是由现代主义者主导的,在认识角度上是理性的、面向实际问题的。分裂的知识系统难以导向有效的行动。理论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大程度是现代主义才特别关心的系统性、可积累性的问题。但是既然理论具体范畴的展开有其特定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不同理论的整合必须首先研究其在这些基础性结构上的兼容性。汤普森从组织个体的目的性行为和功能适应性上,推导出以应付不确定性为核心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解释系统和设计原则,但是在这个基本假设以外的现象就难以涵盖。例如,组织群体的结构惰性、适应不良和死亡现象。

汤普森以后的组织研究重新回到了各个学科。组织实践的丰富性和多学科的进入孔径使得组织理论演化为一个范式林立的领域,或者一个有学科无范式的领域。新的对组织理论的整合,可能不得不依赖更具包容性的范式的创立,而不是在原有范式中拼和合理因素,而即使新范式也可能只是对于部分理论的局部综合。理论整合的难度还在于,某些新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挑战在世界观上的统一性,例如非主流

组织理论的出现,包括批判学派组织理论和后现代组织理论等。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理论推导受到研究背景的限制,这也许对于作者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于其“发展那些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命题”(见作者前言)的意图则不尽然。这也正是如果我们直接比照中国社会的组织实践来检视某些命题则可能貌合神离的原因——作者的语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个市场相对健全、社区发展和具有民主、妥协、自治传统的社会。这些因素最基本地影响了人们的“欲求的结果”和“因果的信念”,直接带来组织设计、结构和行为的差异。例如在对社区面临自然灾害时的应急性综合组织的案例分析中,暗含的基本条件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存在,以及信息的合法的自由传播。还必须指出的是,要在这样一本仅仅不到200页的英文作品中做穷尽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而有所侧重就不免有所缓慢。对于组织行为的侧重,就难免缺乏对于组织内行为的探讨(其丰富性可以参见 Downs, 1967);强调各个组织所处环境的差异,就会对组织交互作用缔造的环境生态及其特征缺乏重视;而突出组织的功能性特征,就容易忽略对组织弊病或不适的讨论。

该书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在强调经验研究的同时,该书的全部经验研究都是间接的,来自于作者攻读博士学位到出书之间的大约15年内其他学者所做的研究。作者的一个学生曾这样回忆作者在印第安纳大学著书过程中他们的一次对话,“我问,‘吉姆,你的证据、经验研究在哪里?’吉姆会笑一笑然后说,‘会有的……其他人会做的’”(Cummings, 1992)。第二,该书分析的案例过分集中于教育、医疗和军事



组织,对政府组织的论述不足,同时在国别上过分集中于美国。第三,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该书仅有三个存在一定程度重复的图示。第四,该书虽然强调了人类变量,但是对人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决策的角度研究的,缺乏人类关系学派对于人格因素和人的社会性的重视。第五,由于汤普森试图发展组织的行动理论,因此对于组织群体和社会制度因素的论述差强人意,其对文化同质化影响的分析局限在个人层面。

组织理论,尤其组织社会学,近年在国内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的这一套组织社会学译丛中,尤其克罗齐耶(Crozier)的著述,与该书年代相仿,在基本分析框架和对象上都有大量的呼应之处。在对权力、相互依赖和不确定性等的研究上,汤普森的权变理论框架与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的理论框架不谋而合却又各出机杼。

该书是2003年夏天我和导师 Bert Rockman 教授做“公共行政与政治”的个人研究课的时候初次读到的,并且在一种邂逅知己的心态下把它翻译了。今天不避浅陋将译作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希望这些曾经让我心悦诚服的思想,不会因为我的转述而失去它的简短篇章本来难以掩藏的深邃。

译者最后感谢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对此书的出版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上海大学汤艳文副教授和复旦大学刘春荣博士对译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并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田青女士在将译文转化为书稿的过程中付出的大量努力。

敬义嘉

2007年6月12日

复旦大学

**参考文献**

- Cummings, L. , 1992,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Social Science Bases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To Know As We are Knowing: A Spirituality of Educ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7, Issue 4(Oct, 1992), 808—810.
- Downs, Anthony,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 Selznick, Philip, 1949,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扎尔德前言

詹姆斯·汤普森在1967年出版了《行动中的组织》。该书一经出版即获得广泛好评,为各界所引用和采纳,并迅速奠定了其现代经典著作的地位。该书不仅是引导和激发研究创意的理论读本,还是一本重要的教科书。整整一代的商学院和社会学系的学生都阅读它,并经由此涉猎社会学组织分析的前沿。詹姆斯·汤普森可以被认为是“权变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尽管他本人并没有使用该术语。在汤普森之前,许多行政理论的方法和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寻找“唯一最好的方法”或者对于组织的一般性概括上。而汤普森则强调,组织的结构和动态深刻地依赖于技术的要求、目标、环境压力和协作需要。组织结构和组织反应的不同形态亦深刻地取决于在不同产业中存在的在技术、协作需要和环境压力上的差异。

在《行动中的组织》出版之前,汤普森已经成为同时代组织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之一。作为一个学识敏锐的大师,汤普森的工作在于对重要概念差别的审慎运用,以期说明从大学群体到官僚组织、从教派到立法主体的那些不同组织形式,都可以被看作是为了解决一系列的决策和合作问题的人类创造物。他展示了组织的目标是如何在一个交互的过程中被建立起来,以对环境条件作出应对。从分析组织和行政

系统对于灾难的反应,以及行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汤普森的社会学洞见阐明了社会组织的内在过程。《行动中的组织》不过是进一步巩固了他以严谨和清晰而著称的声望。汤普森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做到了这一点。

汤普森于1920年1月11号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sup>[1]</sup>因其父被美孚石油公司雇用,于1932年迁往芝加哥。在当地的公立高中毕业后,他去印第安纳大学就学并获得工商学士学位,主修金融文书的写作。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汤普森加入了美国空军并服役至1946年。在获得了一个新闻学硕士后,他在《芝加哥商业杂志》作了6个月的编辑,之后去威斯康星教新闻学课程。1950年汤普森被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博士项目录取,并于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本来是想修传播学的博士,但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学位项目)。

在教堂山分校完成学业后,汤普森首先在康奈尔大学工商和公共行政学院工作。当时的院长爱德华·里奇费尔德是一个充满领袖魅力的行政官和学者,他和汤普森开创了共同的事业。他们创办了《行政科学季刊》,由汤普森担任首任主编(该杂志自创办40余年来一直是组织研究领域的顶尖学术杂志)。后来里奇费尔德调任匹兹堡大学校长,汤普森也随其前往,并在1957年担任了新成立的行政科学研究中心主任。1962年他返回印第安纳大学,得到商学院和社会学系的联合任命。1968年,他成为范德比尔特大学社会学系教员,并和我结识成为朋友。4年后他被检测出患上癌症,于1973年9月1日逝世,享年54岁(我的小儿子的中名叫詹姆斯,就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

《行动中的组织》发表于1967年。尽管汤普森之后陆续

发表了几篇理论文章和经验研究,但他之后的主要著作已经从本质上偏离了组织研究。他单独或者与合作者撰写文章,涉及到家庭生命周期和社会发展中的公共行政角色。尽管詹姆斯的文章仍然秉承了说理透彻和立论严谨的特点,<sup>[2]</sup>但《行动中的组织》代表了其思想的顶点,是他对组织动态的比较分析中最详尽和综合性的著作。

该书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行政学和管理学研究者的标准读物。十年前该书已经售罄,然而即使体现其思想风格的权变理论和比较方法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流行,该书仍然被不断引用和使用。汤普森书内的许多创见和章节都可以被看作后来的理论发展的先驱。既然许多学者仍然使用它,常常要求学生阅读其章节,我很高兴 Transaction 出版社同意重印该书。我也很高兴理查德·斯科特——一个在其所在时代居于领先地位的社会学学者和在社会学组织研究的历史和转型分析上卓有建树的学者——为该重印本作了序言。他为汤普森的经典著作在组织研究领域的地位作了优雅而准确的界定。

迈耶·扎尔德  
密歇根大学

---

注释:

[1] 感谢玛丽·汤普森为我提供了有关汤普森生平的信息。

[2] 威廉姆·拉辛和我编辑了汤普森文章的合集, *Organizations and Beyond: Selected Essays of James D. Thompson* (Lexington, MA: D. C. Heath-Lexington Books, 1976)。

# 斯科特序言

拿在你手中的,是 20 世纪少数几本最具影响的研究组织的书籍之一。自从 1967 年面世以来,詹姆斯·汤普森所著的《行动中的组织》已经有力地影响了组织理论和研究的发展方向。这部论著才气横溢、优雅简练,其经典价值历久弥新。我很高兴将它引荐给新一代的读者。

在这个简短的前言里,我会做三件事:首先,介绍汤普森之前的组织研究领域;第二,分析汤普森的开创性贡献;第三,记录在汤普森著作之后组织研究的发展。

## 一、汤普森之前的组织研究

组织研究的历史是悠长而富于变化的,但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才成为一个稳定和公认的学术领域。之前的工作主要体现为四个重要贡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比较研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学管理研究;埃尔顿·梅约(Elton Mayo)和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人类关系研究;以及切斯特·伯纳德(Chester Barnard)和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适应系统观点。

## 1950 年以前

20 世纪初的一个明显趋势是植根于共享文化、低流动性和延伸的亲缘纽带的传统社会结构不断让位于高流动性的、分化的和非个人的秩序。与同时代许多社会学奠基者一样，伟大的社会理论家韦伯致力于探索社会秩序的变动基础。韦伯观察到西方社会率先迎来了民族国家的崛起，并且在企业组织的推动下迅速走向工业化。在韦伯的理论架构里，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制度正在替代传统型和魅力型的行政模式，而公私官僚机构的崛起集中体现和承载了这些新的理念和价值。

令人吃惊的是，弗雷德里克·泰勒(1911)几乎在同时观察和分析到了这个大转型。但是作为更具实用倾向的工程师，泰勒主要侧重于工厂内生产方法的变化。泰勒并没有局限于描述和理解这些变化，而是积极深入地推进这些变化。在寻找组织生产任务的“唯一最好的办法”的探索中，泰勒首先从个别的工作任务和工人出发，但是迅速转而考虑对整个生产过程——包括一线监督人员和工厂经理——的改革。泰勒的思想和方法被迅速引入到其他领域中以实现工作重组，例如在学校和其他服务性组织中的改革(Calahan, 1962; Kanigel, 1997)。韦伯和泰勒的努力重点都在于提高生产和行政的理性化水平。

与之相反，一批人类关系学派的学者认为，以上这种对于工作和工人的概念过于个人主义化和理性化。他们的研究结果使他们起来挑战这种视工厂为纯生产系统和视工人为纯经

济主体的看法。他们注意到工人间(后来扩展到经理间)社会纽带的重要性,并且记录了在组织工作过程中非正式结构和非理性动机的角色(Mayo, 1945; Whyte, 1946)。在更宏观的层次上,伯纳德(1938)和塞尔兹尼克(1948)认为组织是一个适应性系统,适应的目的是在所处环境中获得生存。他们的功能性研究方法强调组织不仅仅是技术系统,而且还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系统——组织必须体现其参与者和更宽广范围内的委托人所重视的准则和价值。

仅仅在回顾的时候,这些早期的理论和研究才被视为组织研究的前身。韦伯的著述长期被划为“宏理论”或是经济社会学。泰勒被看作一个沉迷于时间动作研究和效率的狂热工程师。人类关系学者则被视为社会科学家,他们专心于证明一些一般性的社会过程——例如非正式的控制和承诺——在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环境中同样存在。与前者相反,伯纳德和塞尔兹尼克指出组织不仅是更广泛社会趋势的指示器或工作环境,而且还是独特的社会系统,即集体行动者。

古尔德纳(Gouldner)在1959年提出了一篇开创性论文。他在研讨尚显幼稚的组织研究领域基础上,就确认组织理论的内在主要逻辑迈出了重要一步。在韦伯、泰勒和人类关系学派分析家的著作内,古尔德纳发现了“理性系统”和“自然系统”两个主要的内在模型。这两个模型有力地解释了在组织研究者中存在的混淆和冲突。理性系统研究者将组织视为能够自觉加以塑造以实现既定目的的工具。在参与者可以控制组织发展的假设上,组织研究的重点是理性的设计和规划。相反,自然系统分析者将组织视为有机的系统,是通过自发的



非决定性过程而进化的集体。系统的生存是高于一切的目标,而适应构成了组织活动的主要过程。将这些内在冲突的假设和模型凸显出来,尽管似乎在表面上扩大了矛盾,但是实质上反而让学者可以比从前更容易地看到该领域内的连贯一致性。当领域内的核心争论得以确认,争论的主角得以清晰定义时,更有可能激发整合理论的努力。

古尔德纳对于理性系统和自然系统两个相互竞争模型的确认,为汤普森构造其独特的理论方法提供了首要的理论基石。

### 进入开放系统

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之外出现了能够重塑和重定义组织研究的新发展。1950年代中期,在生物学家例如路德维格·波尔塔兰费(Ludwig Bertalanffy)和信息理论家例如罗斯·埃西柏(Ross Ashby)和诺伯特·维勒尔(Norbert Wiener)的领导下,一个叫做“一般系统理论”的知识运动出现了。这些学者认为从微生物到行星等许多科学现象都是以系统的方式运行,但是这些系统在复杂性、反应性、耦合程度上存在差异。肯尼斯·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 1955)是最早认为组织是开放系统的理论家之一,他将组织特征归纳为很高的复杂性、反应性以及系统成分之间的松散耦合。开放系统的概念使组织学者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组织内部的特点和过程,而开始充分意识到组织与环境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早期将开放系统观点最完整地应用于组织研究的是卡茨和卡恩(Katz and Kahn, 1966)的《组织的社会心理学》。